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体用逻辑

张忠胜,李一凡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摘要:“体”“用”是最能彰显中华民族思辨智慧的范畴之一,对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交织着主要与次要、主观与客观、内因和外因、普遍性与特殊性等哲学辩证法的智慧经纬,科学解答了“体用之辩”。总体而言,“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体用逻辑体现在对三个核心问题的深刻解答。其一,清晰界定了文化生命体内在构成的主客体关系,并在二者的和谐共生中强化了文化主体性;其二,精准把握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内在驱动与外在推动的合力作用,推动文化生命体的自我更新;其三,强调将创造文化生命体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立足人民园地,在人民实践的火热浪潮中推动文化发展、文明创造走实走深。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文化生命体;“体用之辩”;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5-0001-06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的原创性贡献之一,“第二个结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高度契合到相互结合中“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这一新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种“‘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1],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体用之辩”的哲学辩证法。既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主体性和功能性的深刻洞见,又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内外因相互作用的根本动力机制,并在实践与理论的双向互动中实现理论升华。“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的集中彰显。

一、厘清文化生命体内在构成上的“体”与“用”

“体用”范畴有“主从”之意,新时代创造新的文

化生命体,需分清这个生命体在内容上的主体构成,并促进主要内容和补充内容的有机结合。“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用马克思主义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新’”^[2],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建,离不开中华各民族儿女的主体创造活动。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与中华儿女的主体创造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

1. 坚守中华文化主体地位,发挥中华儿女主体作用

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首先要明晰的是,这个文化生命体的内容上的主体构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3]显然,作为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且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生命体,必然要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主体内容。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必须要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不可妄自菲薄、数典忘宗。历史已经充

收稿日期:2024-07-01

基金项目:中央财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基金2022年度资助课题(2022ZXJG29)

作者简介:张忠胜(1981-),男,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新疆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援疆),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李一凡(2000-),女,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19805419871@163.com

分证明,任何背叛或者抛弃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难逃衰落乃至湮灭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理为指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在科学的轨道上运行。如果民族文化的主体都被舍弃,则无以谈及中国特色,而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都被消解,也谈不上是社会主义文化。“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主体,坚守其在文化生命体中的主要地位,渗透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传承文脉、致力复兴的清醒自觉。新的文化生命体出场自带鲜明的中国特色,为构建与我国综合实力相匹配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文化资源基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走向世界。

其次,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要坚持各族中华儿女的主体创造地位。一方面,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本体,激发了中华儿女高度的文化自信,由此衍生出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向内凝聚各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由民族认同拓展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圈层化迭代过程”^[4],又是捍卫中华文化主体地位、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过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形成、嬗进和深化了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气壮山河的奋斗凯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思潮更加纷繁复杂、社会价值取向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元的现实,民族团结与民族和谐受到挑战。“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用”,发挥中华文化的纽带作用,激发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各民族中华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和心和家和国和实现“和合共生”,由此产生强大的“合力”。这股“合力”是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强大主体力量,可以持续地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乘风破浪。

2. 在“共相”和“殊相”的辩证统一中推动“主体”“客体”有机结合

分清文化主体内容上的“体”与“用”,不是为了

一家独大、排斥非主体的零散内容,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补充资源与主体资源的有机结合。所谓的“体用有别”是在一定范围内成立的相对真理,在特定的情形下能够实现矛盾对立面的转化,促使“体用有别”走向“体用结合”。“第二个结合”创造的文化生命体,不是“西化”“儒化”“僵化”的产物,而是马、中、西各方文化资源内在交融、良性互动形成的优秀成果。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体”和其他一切人类文明之所长构成的“客体”相互融合,其背后具有深刻的理论支撑。依据唯物辩证法联系和发展的总观点,尽管不同地域国家的文明各有“殊相”,这是事物多样性天然差异的表现。但事物之间同时具有普遍的联系性,文化品质具有相融性,文明之间存在着“共相”。充分把握文化文明之间的联系,可以实现融合发展。同样,不同时代的文化成果,也有共同点和交集。“共相”和“殊相”是构成多文化融合机制的重要基础,推动优秀资源的有机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确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与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狭隘主义有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也不是敌视和对立的,而是“力求和它相结合”^{[5]39}。中国共产党人对“体用之辩”的思考天然蕴含中与西、古与今两对辩证关系。在构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实践中,以高度的理论自觉,通过灵活调整适应条件,在把握各类资源的联系中创造兼具古今中外气质的文化生命体。从“中体西用论”到“综合创新论”再到“马魂中体西用论”等重要论断,都是推动文化更新的积极探索;从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到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新理念,都强调文明的创造需要实现创新与继承的辩证统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化,我们党在探索中华文明发展新路径的过程中,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一种觉醒”^[6],这种觉醒是渗透着理性光辉的觉醒,深刻把握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在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探索中,将主体内容与辅助内容融为一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创造出兼具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

性与时代性的文化生命体。

二、探赜文化生命体发展动力上的“体”与“用”

“体用”作为方法论范畴强调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遵守的根本原则。“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既涵盖文化价值观层面的“体”,也包括方法论意义上的“用”。文化生命体之新是中华文化自我革新的结果,中华文明突出特征为文化生命体更新提供了根本动力。不过不可否认,西学的传播和异域文明的影响也是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之一。“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科学把握客观存在的变化,确立方法论原则,挖掘中华文明的内生根本动力,同时又善于运用外力,实现了文化生命体的推陈出新。

1. 中华文明的特征优势是文化生命体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至今,并成为当代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主体,与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命力密不可分,而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突出的包容性与创新性特征之中。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取得诸多卓越成果,“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7]。一方面,包容性增强了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并在认同中使文化得以古今流传。正所谓是“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1]。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创新性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世不衰的基础。“第二个结合”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强大的生命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作为创造文化生命体的根本动力,在科学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中发挥其创新禀赋,使中华文化在本体生命的内生裂变中实现自我飞跃。在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中,外来文化的冲击抑或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启发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根本而言,文化生命体更新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是中华文明内在特征赋予的。外在力量只是一种外在的、次要性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生命体更新起了加速或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中华文化自我创造、自我更新的根

本动力,可以称为发展动力上的“体”,其他外在力量只是作为一种“用”而存在。

但是在近代伊始,伴随着西盛东衰的历史演进,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权威性和价值受到挑战和质疑,这具有历史必然性。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405}。这造成了东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巨大差异,在东方世界从属西方世界的客观现实面前,产生“学徒心态”“自卑心理”是在所难免的。与此同时,西方文明凭借资本生产力带来的巨大荣光,对其他文化进行侵蚀和同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9]35}它迫使世界其他民族接受西方文明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推崇丛林法则,而丛林法则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明价值观相违背,由此出现了“东方化对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东方化的节节斩伐”^{[10]15}的现象。中国文化主体意识被淡化、中华文化一度面临着难以赓续的沉重危机。但是中华文明并没有因此断裂,而是在危难之中实现了“大破大立”成功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外来文化和思潮的涌入似乎成为了文化转型的直接推手,但深究其理,传统文化转型之所以能够实现转移,并非全然是外力使然,而是其内蕴含的强大生命力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是这种坚韧的内在生命力,使得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挑战时能够自我调适、创新发展。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以“第二个结合”为锐利武器,一方面清醒审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从中汲取历史文化养分;另一方面赋予中华文化高度的时代意识,勇于拥抱并吸纳现代文明所孕育的先进理念与科技成果。传统与现代深度交融,不但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而且巧妙借助外在动力,实现“体”与“用”两个层面的深度融合与相互促进,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2. 灵活调试促进“文化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协调共进

推动文化生命体转型升级、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涉及文化现代化,这—问题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11]。文化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密不可分。事实上,文化的主

体性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当物质基础层面的主体性得以确立之后,巩固文化上的主体性就变得极为紧迫。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这一创举蕴含着物质意识与社会存在相适应、相互促进的辩证智慧。李大钊“第三新文明”的构想,倡导通过调和古今与中西,“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12]205},展现了整合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创新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在1930年5月所著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3]111-112}精准地把握了意识与存在相互作用的微妙平衡。邓小平提出“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一系列朴实生动的论断,深入实际评估理论,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宽度。习近平高瞻远瞩提出“两创”“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也是对物质与意识关系的深度思考。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中国化”和“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文化成果。

“第二个结合”富含丰富的辩证法基因,汇聚多元驱动力,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追溯理论渊源,马克思曾对文化如何塑造个体行为及影响社会历史进程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恩格斯则在探讨文化、经济与政治三者的关系时,明确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能动作用,特别是指出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其独到的原创性贡献,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它精准界定了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引领地位与文化客体功能的多样性,厘清了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根本动力与辅助动力,实现了文化本体论与实践应用论的完美融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之光得以交融汇聚,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注入强大的创新力,推动了文化生命体的结构性调整和时代性构建。在此过程中,中华文化的自主驱动力是主导性引擎,外在力量发挥辅助作用,二者共同作用、相互交织,构建了既超越“传统—现代”二元论,又超越了抽象的“东西之

争”^[14]的新文化生命体。这一深刻转变,为“第二个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更宏阔的历史纵深”^[15],提供了与物质基础硬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优势”^[16]。文化“软实力”与物质“硬实力”相辅相成,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光明的前景。

三、“体”“用”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互动中走实走深

“体用之辩”渗透着中华民族知行合一的智慧,实践的广阔空间为“体用贯通”提供了根植的沃土,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提升了理论的高度。“第二个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有本体论、认识论高度上的整体观照,又有实践论、方法论上的具体指导”^[17]。不仅在理论上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而且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铺设了坚实道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支撑下,新的文化生命体应运而生。它贯穿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通用贯通”的鲜明品格,在人民群众的实践园地中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1. 从“体用有别”到“体用贯通”

在近代史上“中体西用”论的命题中,“体”和“用”分别代表了“中”与“西”,“‘中’仅仅是‘体’,‘西’纯然为用”^[18],二者完全分离,这就否认了其相互关联的可能性,走不出“体”“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厘清“体”与“用”不是为了割裂“体”“用”,恰恰相反,是为了“明体达用”,使理论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实际上,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体用”一直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比如,“经世致用”是儒家传统体用观的价值追求;“明体达用”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征和意理旨归;理论的创造必须与实践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主张和优良传统。“第二个结合”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理论力量,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对立的斗争关系中,科学把握矛盾的统一性,实现了对立面的转化,创造了体用贯通的新文化生命体,走出了“体用有别”的狭隘维度。理论限度的拓宽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搭建了独特框架,并在实践

中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为在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推进“第二个结合”开拓文化发展新境界科学指引和现实路径。

“第二个结合”是在“第一个结合”的前提下的文化逻辑深入演进,“第一个结合”为“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思想前提,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不是抽象地阐述理论,而是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发展其自身。其中既有对文化理论的新突破和文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又涵盖新时代党领导宣传文化工作的总部署和总要求。譬如,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之一,彰显了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认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作用、原则要求,巩固了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文化建设领域的“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等重大创新,体现出党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的高度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先进理论在实践中形成,又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深化升华,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任务上升到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

2. 在人民实践中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丰富与深化

“第二个结合”实现了文化生命体创造中“体”与“用”关系的辩证统一,这一统一性的根本归宿,正在于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历史创造与文化创新实践中。“第二个结合”在“体用”结合中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19]¹⁹,赋予了其“本土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鲜明特质。“本土化”的烙印,让新的文化生命体扎根中华大地的独特土壤之中,广泛吸纳各地域文化养分,绽放出独特的地域光彩与民族韵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表达形式;“时代化”的翅膀,为其注入了不竭的创新活力与时代精神,通过持续吸纳新时代的思想精髓与科技成果,展现出前瞻性的视野与引领潮流的力量;“大众化”的桥梁,赋予文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使其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接受和掌握。文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而是走进

了寻常百姓家。“本土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三大特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促使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不断丰富和深化。

实践之路不止,理论之树常青。“第二个结合”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融于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场域,极大地拓宽了其群众基础,为文化生命体构建了坚实的基石。这一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双向互动的生动体现。未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步伐的稳健迈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进行新的结合。新的结合将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开辟出更为广阔理论和实践深化空间。在理论层面,为新的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全新的视角,形成对文化的本质、价值和发展规律更深刻的认知。在实践层面,为深度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提供新手段和新思路,“促使我们更加主动地在建设的意义上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或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内容塑造现代社会”^[20]。在新时代的无限机遇中,新的文化生命体将以持续创新实现自我革新,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与精神力量,书写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篇章。

四、结 语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一场深刻的哲学思辨与实践探索,对传统“体用之辩”这一古老深邃的哲学议题进行了现代诠释。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的思辨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持续进化的内在机理,成功接续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与卓越禀赋,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从被动适应迈向主动引领的壮丽征程。“体”之深邃与“用”之灵动在跨越时空的哲学交响中完美融合,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它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韵味,又融入了现代社会的活力与创新,在文明的交融里织就绚烂多姿的文化锦缎,勾勒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宏大蓝图。这不仅体现了对过去文明传承的敬畏之情,更是对未来文明共荣的庄严承诺。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 2023(17):4-11.
- [2] 段虹,孙向宇.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创新[J].东岳论丛,2024(6):5-11.
- [3] 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01).
- [4] 方堃,明珠.多民族文化共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9-15.
- [5] 方克立.方克立论著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 [6] 颜晓峰,任倚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界历史意蕴[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11.
- [7]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学术研究,2003(7):5-9.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11] 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24-10-14(01).
- [12]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唐爱军.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重视角[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2):44-56.
- [15] 邹广文,赵月.以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空逻辑[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6):5-14.
- [16] 朱继东,许莫晗.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意义[J].思想战线,2024(4):1-9.
- [17] 庄荣文.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N].人民日报,2023-11-01(09).
- [18] 杨国荣.体用之辩与古今中西之争[J].哲学研究,2014(2):36-42.
- [1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0] 乔清举.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J].船山学刊,2023(6):1-11.

Study on the New Cultural Form Minted through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n a Logical View of Subjectivity and Application

ZHANG Zhong-sheng, LI Yi-fa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Subjectivity” and “application” is one of the categories that can best highlight the Chinese wisdom in thinking and discerning and has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The emergenc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gives rise to a new cultural form, which intertwines with the wisdom lines of philosophical dialectics, encompass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aspect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and scientifically answers the “dispute surrounding subjectivity and applic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ubject and applying logic of the new cultural form that is minted through “the Second Integration” provides answers profoundly to three core questions. Firstly, it establishes a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internal constitution of this new cultural form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he two. Secondly, it accurately grasps the underlying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o promote the self-renewal of the new culture through the joint effect of internal drive and external impetus. Thirdly, it emphasizes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reating the cultural form to make solid progress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creation in the hot wave of people’s practice based on people-centeredness.

Key word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e cultural form; “debate of subjectivity and application”; logic

【编辑 吴晓利】